

谭学纯 著

中学语文教材 比较赏析

ZHONG XUE
YU WEN
JIAO CAI
BI JIAO
XIANG XI

安徽文艺出版社

安徽文艺出版社

谭学纯 著

中学语文教材比较赏析

中學語文教材比較賞析

譚學純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庐江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125 插页: 2 字数: 110,000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0,500

定价: 1.60元

ISBN 7-5396-0061-9/I·61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国内第一本全面、系统地对新编中学语文统一教材进行比较赏析的教学参考书和自学指导书。

它适应目前中学语文教学容量大、节奏快的形势，囊括从初一到高三语文教材的重要内容，通过多层次、多侧面、多视点的比较赏析，指导中学生在比较中进行快速阅读和快速分析，学习不同作家相同或相近题材各具特色的艺术处理，掌握多样化的写作技巧，奠定坚实的语文基础，增强语言能力。

它从当前中学语文教师的实际工作状况出发，帮助教师运用比较的方法备课、授课，使学生可在较短时间内同时接受两篇以上同类课文的学习，既有利于开发学生思维，又有利于减轻教师负担，为教师带领学生复习迎考赢得了更多的时间。

本书信息量大，实用性强，分析方法灵活，分析角度新颖，文风生动，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是广大中学生和中学语文教师的良师益友。

目 录

序

小 说

幻灭了，希望的肥皂泡

——《春蚕》与《多收了三五斗》比较赏析……………1

悲剧，刻在被扭曲的灵魂上

——《范进中举》与《孔乙己》比较赏析……………10

生命之旗，在死亡中高扬

——《百合花》与《黎明的河边》比较赏析……………19

壮美的造型 崇高的精神

——《七根火柴》与《党员登记表》比较赏析……………29

哈哈镜里的悲惨世界

——《竞选州长》与《警察和赞美诗》比较赏析……………35

散 文

夕拾的朝花依然温馨

——《藤野先生》与《我的老师》比较赏析……………45

写在红叶和翠竹上的赞美诗

——《香山红叶》与《井冈翠竹》比较赏析……………53

天河恨 长城泪

——《牛郎织女》与《孟姜女》比较赏析……………61

滂霖风雨洗涤出崭新的世界

——《海燕》与《雷雨前》比较赏析……………75

美，在山光水色中

——《小石潭记》与《醉翁亭记》比较赏析……………83

世之奇伟，常在险远

——《游褒禅山记》与《游黄山记》比较赏析……………91

朴素哲理的珍贵启示

——《陋室铭》与《爱莲说》比较赏析……………97

诗 歌

诗心，在夜静和鸟歌中萌动

——《静夜》与《春鸟》比较赏析…………… 102

呼唤自由和光明的二部轮唱

——《天上的街市》与《黎明的通知》比较赏析… 111

这里汇流着两代人的血液

——《西去列车的窗口》与《青纱帐—甘蔗林》比较赏析…………… 118

双壁，显示着人性美的真谛

——《孔雀东南飞》与《木兰诗》比较赏析…………… 126

双星，照耀着灿烂的文化史

——《行路难》与《兵车行》比较赏析…………… 135

清辉撒下的情思

——《静夜思》与《鸟鸣涧》比较赏析…………… 143

离歌琴弦上的强音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与《别董大》比较赏析… 150

正气，在历史长河中流淌

——《过零丁洋》与《石灰吟》比较赏析…………… 156

幻灭了，希望的肥皂泡

——《春蚕》与《多收了三五斗》比较赏析

面对阳春三月白胖胖的蚕宝宝和入秋以来沉甸甸的稻穗，老通宝和旧毡帽朋友心中闪起了欢乐的火花。火花的光影里，跳动着憨厚的农民们质朴的希望：他们希望汗水换来好收成，希望丰收之后那凄苦黯淡的日子会多少增添一些光亮的色彩。他们确实丰收了，但随之而来的不是轻松的微笑，而是加倍的艰难……

有谁从希望的峰顶一下子跌入失望的冰谷吗？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民经历过这种巨大精神创痛。茅盾的《春蚕》和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最典型、最集中地反映了这种创痛。

丰收成灾，是这两篇小说的共同主题。在希望和现实的冲突中表现这一主题，是两篇小说的共同特点。

在《春蚕》中，茅盾不无辛酸地描写了农民的希望：

只要蚕花熟，就好了！他们想到一个月以后，那些绿油油的桑叶就会变成雪白的茧子，于是又变成叮叮当当响的洋钱，他们虽然肚子里饿得咕咕地叫，却也忍不住要笑。

但就是这苦涩味很浓的希望，也还是被现实击得粉碎。“绿油油的桑叶”经过农民们勤劳的双手、紧张的拚搏，能够变成“雪白的茧子”。然而，“雪白的茧子”要经过社会的中介，在流通中实现价值的时候，却不能或很难变成“叮叮当当响的洋钱”。在洋货泛滥和战事中丝茧厂纷纷倒闭，卖不出去的蚕茧因此产生强烈的讽刺意味：春蚕越熟，蚕农越穷。老通宝则因为养蚕的数量和质量超过别人，亏本更甚。

现实毁灭了农民们的梦。这梦，叶圣陶笔下的旧毡帽朋友也做过，并且，同样悲惨地幻灭了。

穷苦的农民揣着希望踏上万盛米行的河埠头。这希望来自简单的推理：难得今年风调雨顺，没有虫害，一亩田多收了三五斗，“谁都以为该得透一透气了”，这希望包含着低微的要求：缴租、还债、购买生活必需品。但是由于洋米洋面冲击市场、投机商人“同行公议”，以及残酷的地租和高利贷盘剥，农民不得不忍痛贱价卖米。于是，产量的增值和贫穷的增值荒唐地构成了等式。

幻灭了，希望的肥皂泡！它给予读者的艺术领悟，远远超出了自身：当老通宝从官河边的塘路上走来；当旧毡帽朋友酱赤的脸出现在河埠头的石级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悲剧的序幕。但是，当老通宝远征无锡，懊丧而归；当旧毡帽朋友各自还乡，船埠冷落的时候，却并不意味着悲剧的终结。因为，老通宝远征途中的萧条，和一批又一批摇到万盛米行河埠头的敞口船，扩展了悲剧的范围，显示了作品主题的广度和深度。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它的时代的表现。它的内容和它的形式是由这个时代的趣味，习惯，憧憬决定的，而且愈是大作

家，他的作品性质由他的时代的性质而定的这种关联也就愈强烈愈明显。”①

《春蚕》和《多收了三五斗》的“作品性质”都“强烈”而又“明显”地联系着“时代的性质”。这首先表现为作品真实地再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

三十年代初期，帝国主义经济渗透，打破了中国古老封建社会的局部平衡，引起了一系列恶性循环和连锁反应，两篇作品中所作说的“东洋人打仗”、“上海不太平”则使我们看到了经济掠夺之外的军事侵略。中国社会日趋一日向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深渊下滑，农村经济更出现了不可挽回的颓势。旧中国在双重侵略的强大冲击波中摇摇欲坠，这在《春蚕》中有一处暗示性描写：官河中一艘小火轮威严地驶来，平静河水激起泼刺刺的波浪，把乡下赤膊船和船上的人冲得象在打秋千。浜田正秀曾盛赞《罪与罚》中拉思科里尼柯夫杀人后，作者描写的涅瓦河岸的象征性风景。②其实，《春蚕》中这深沉蕴藉的一笔，又何尝不画出了绝妙的象征性风景。它以如此形象的笔触，给人悲剧性暗示，把读者的视野引向急剧动荡的社会。的确，旧中国这只赤膊船，经不起小火轮的螺旋桨搅起的巨浪，外力的野蛮冲击，给这只破旧的小船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老通宝朦胧地直觉到

自从镇上有了洋纱、洋布、洋油这一类洋货，而且河里更有了小火轮船以后，他自己田里生出来的东西就一天一天不值钱，而镇上的东西却一天一天贵起来。他父亲留下来的一份家产就这么变小，变做没有，而且现在负了债。

旧毡帽朋友也极不情愿地听说：

各地方多的是洋米洋面，头几批还没有吃完，
外洋大轮船又有几批运来了。

大批洋货流入市场，加速了旧中国经济的崩溃，激化了社会矛盾。丰收无助于经济杠杆的平衡，相反，却把农民引向更加贫困的绝境。

正是在上述背景上，两篇小说从各不相同的角度，反映了特定时代人民的苦难，以及人民对自身出路的探求。从而构成了作品时代精神的另一项内容。借用茅盾的话说，便是：一方面描写“时代给人们以怎样的影响”，另一方面描写“人们的集体活力又怎样地將时代推进了新方向”。③这在《春蚕》中，前者表现为老通宝的悲剧性抗争；后者表现为以阿多为代表的具有新思想的农民初步的觉醒。在《多收了三五斗》中，前者表现为旧毡帽朋友的悲剧性命运；后者表现为绝望的乡亲们探求改变贫苦现状的途径。两位作家在揭露社会黑暗的同时，都透露了变革社会的历史趋势，由此拓深了作品的认识价值。

注重风俗人情的刻划，也是两篇小说的共同之处。

江南极普通的蚕事，在《春蚕》中似乎充满了神秘感；那再现了太湖水乡桑蚕人家风俗的大蒜头；那“宝宝”上山时的忙碌场面；那对“蚕神”“蚕花娘娘”膜拜的虔敬心理；那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隆重而又神圣的收蚕仪式……给紧张辛劳的桑蚕活动罩上了神秘的雾。拜物心里和天命观，好象把我们带进了相对原始的风俗中，这里生活着一群朴实

的乡民，他们脸上滴到了蚕尿，觉得难受，“心里却快活”，“巴不得多淋一些”。他们有很大的忍耐力，又有很大的幻想。尽管这幻想跟那神秘的雾一样，永远捉不到手中。

风俗人情在《多收了三五斗》中也有细致生动的描写：终年劳累的旧毡帽朋友希望落空以后在船上喝酒。一点酒，一点熟肉，加上自备的咸菜豆腐汤，是他们难得的筵宴。女人在船梢头烧饭，条条船冒烟；个个人流泪。孩子们却在苦中保持童稚，在空舱里跌交打滚；捞起河面上的脏东西来玩。男人们酒到肚里，话就多起来。“相识的，不相识的，落在同一的命运里，又会饮在同一的河上。”你发泄一通，他骂几句。然后各自回村，船埠头冷冷清清荡漾着暗绿色的脏水。勤俭的生活习惯、淳朴的人际关系，增强了作品的乡土气息。

应该看到，茅盾和叶圣陶笔下的风俗人情，不是自然主义的简单摹写，而是现实主义的深刻透视。这里，可贵和可悲、古朴和陋旧，韧性和麻木，交织成矛盾的复合体。联系两篇作品的主题和时代精神，我们不难体会，作家对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的赞扬中，含有一定思想容量的潜台词：在社会正产生质变的时刻，人们应早日走出那古老的生活习俗。

分别借助典型形象和典型场面反映共同的主题，是这两篇小说表现手法的区别。

茅盾侧重于老通宝性格多层次、多角度的塑造，把希望和现实的冲突揉合进典型性格和典型环境的对立，从而揭示主题；叶圣陶截取生活的横断面，借助四个典型场景，组合成有机的统一体，展示主题升华的内在联系。

老通宝是一个性格复杂的旧式农民形象

从积极的方面看，他勤劳、坚毅、单纯，在向命运的抗争中屡屡碰壁，虽也曾迷惘，却从不动摇。他虔信劳动发家，全身心地投进那没有成效的劳作。《春蚕》中最紧张的劳动场面，总是伴随着这个控制全局的老农民的形象出现。

从消极的方面看，这个在中国封建社会乡村的贫瘠土壤里生长的淳朴农民，在继承了父辈美好品性的同时，也从千百年来在封建轨道上缓行的社会中国袭了保守、落后的思想方式。面对正在发生变化的生活，他疑惑、不满、怨愤，但又顽固守旧，以不合时宜的方式抗争社会的激变：别人告诉逆，因为战事，丝茧厂都关闭了，老通宝表示怀疑。这匹“识途老马”自信活了六十年，从没见过桑叶不喂蚕，而等到成了枯叶去喂羊。他明知道当时的世道，什么都是“洋”字上前，蚕茧也是洋种卖得贵，他咒骂以后大概“连桑叶都要洋种了”，但又固执地要养土种蚕，只是为了缓和家庭矛盾，才勉强养了一张洋种蚕。这使他在一场注定要输的赌博中输得比别人更惨。他怨恨越变越坏的世界，却找不到适应这一社会环境的自身的合理位置。

正是老通宝性格中的这些消极因素，与人物所处的典型环境产生了尖锐的对立。这一过程可简单表述为：老通宝由自身的不变怀疑社会的剧变；用自身的不变抵制社会的剧变；因自身的不变怨愤社会的巨变。

如果说，老通宝性格中积极因素在畸形的社会环境里，可悲地走向自我嘲弄的结局，那么，他性格中的消极因素则增加悲剧的必然性。这里既有矛盾对造成悲剧的社会病根的挖掘，也有作家对保守、落后的思想方式的批判和否定。这便

是《春蚕》中典型性格塑造所达到的思想高度。

当茅盾通过人物性格和社会环境的冲突史再现事件的完整过程时，叶圣陶却别出机杼地把一个时代的悲剧凝缩在四个场面中。

第一个场面是万盛米行里旧毡帽朋友贱价粜米：一批又一批敞蓬船载着丰收之年雪白的大米泊近河岸。米行里，斜倚着柜台的老板从眼镜上投射出鄙夷的眼光，悠闲地把烟头掷到街心，轻蔑地瞥一眼刚运来的大米。大米的主人忐忑不安地等待检验的结果，希望听到合理的米价。柜台的另一边，一位旧毡帽朋友正“把万分舍不得的白花花的米送进万盛的廒间，换了并非白白的现洋钱的钞票。”这里，焦距对准了主题，丰收和贫困同时摄入镜头构成的对比性画面，发人深思。

第二个场面是旧毡帽朋友在小镇上有选择地购买生活必需品：小小的城镇，洋货充斥市场。洋肥皂、洋油、洋布、洋镜、洋囡囡、洋喇叭、洋铁铤鼓、洋磁面盆，随处可见。店伙计拉拉扯扯地牵住农民们的布袄，招徕生意。他们知道唯有今天，农民口袋里有几张钞票。在紧缩预算的踌躇后，穷苦的农民把刚到手的钞票一张两张地数出，不得不买的日用品缩减再缩减地买进。女人们把蛋圆的镜子拿到手里又放回橱窗，绒绳帽子套在小孩头上正合适，试戴了又摘下……这里，洋货泛滥为第一个场面贱价粜米的原因作了具体的补充说明，而农民购买力低下和内心世界的复杂，则有效地增强了主题的分量。

第三个场面是作品情节的高潮，失望的农民借酒浇愁。主要靠音响组接镜头。原文四十多行连续性酒后怨言，仿佛

在读者的面前推出一张张愤懑的脸。声画对位产生的艺术效果，凝炼地再现了特定情境的场景。

“去年是水灾收成不好。亏本。今年算是好年时，收成好，还是亏本！”

“今年亏本比去年都厉害，去年还果七块半呢。”

……

“田真个种不得了！”

“退了租逃荒去吧。我看逃荒的倒满写意的。”

……

“我们年年种田，到底替谁种的？”

……

“真个没得吃的时候，什么地方有米，拿点来吃是不犯王法的。”

这些看似散乱的谈话，包括逻辑关系清晰的四个中心话题：一、指出事实，收成好坏都亏本；二、寻求生路，退租逃荒；三、提出疑问，为谁种田；四、流露反抗情绪。鲁迅说：“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用，他便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他们已经很愤怒，所以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复仇。”^④叶圣陶用艺术的形式反映了鲁迅的理论概括：旧毡帽朋友“叫苦没用”，于是“哀音”变为“怒吼”，而这种“愤怒之音”总有一天要“爆发”出强有力的行动。这是历史的必然。

第四个场面是作品的尾声，到处表演着同样的悲剧。我

国戏剧家焦菊隐认为：“在高潮之后，最好能再有些余波，象落日斜辉一样，来一个‘回光返照’。”^⑤此处的尾声正象高潮的余波，激起的波浪图迅速扩大，使旧毡帽朋友的悲剧获得了普遍的社会意义。

四个场面相对完整，但又互相联系、互为因果。随着空间的转换，作品逐步呈示思想深度。作家在这些场景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倾向性，出色地完成了现实主义的艺术创造。

① 普列汉诺夫《论西欧文学》第1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② 参见滨田正秀《文艺学概论》第35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

③ 茅盾《读〈倪焕之〉》。

④ 《鲁迅全集》第3卷第314页。

⑤ 《焦菊隐戏剧之论集》第29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悲剧，刻在被扭曲的灵魂上

——《范进中举》与《孔乙己》比较赏析

吴敬梓笔下的范进：十八世纪中叶封建科举制度的受害者；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二十世纪初叶封建教育熏陶的畸形人。前者疯疯癫癫，一脚穿鞋，一脚光着，由炼狱跨入了天堂；后者凄凄惨惨，孤独寂寞，拖着断腿，用手爬进了墓窟。他们同途殊归，用同样辛酸的泪水，浸透了自己受戕害的一生。

这是一幕漫长的人生悲剧，它延展在《范进中举》和《孔乙己》的字里行间，刻在范进和孔乙己被扭曲的灵魂上。

两篇作品都让主人公自己强化他所置身的悲剧：范进的可悲，在于他的精神已被封建科举污染，他梦寐以求，渴望从科举的阶梯爬上社会上层，使悲剧在他自身的追求中升格；孔乙己的可悲，在于他的性格已在封建教育中变形，他至死不悟，强撑读书人的架子，使悲剧在他自身的炫耀中升级。

封建科举和随之而来的功名利禄，对范进来说，就象《红楼梦》中贾瑞眼里的“风月宝鉴”。淫荡公子只看到镜中美人的面，不看骷髅的一面，结果自戕丧命。范进也只看到这“风月宝鉴”中的荣身之路，看不到这条路上的精神骷髅，以致科举取士的毒液侵入了骨髓。

当范进在胡屠户的辱骂中走进作品的时候，我们看到

的，是一个空有男儿之躯的、猥琐、懦弱、自卑自贱的奴才。从二十岁到五十多岁，八股取士年复一年地持续，考场上却总是这个屡试不第的老童生。几十年科场失意、半辈子穷困潦倒，这个僵死的灵魂，已被科举制度摧残得丧失了人的起码尊严，因此，面对丈人无理的斥骂，他只能“唯唯连声”地称道“岳父见教的是”。

然而，更深一层的悲剧是：范进还没有从折磨了他几十年的梦魇中醒来，就匆匆忙忙地走进了新的恶梦。

因宗师“舍与”，年过半百中了秀才的范进，心里很快又燃起了沿科举之路向上爬的欲火。他找岳父借路费参加乡试，被骂得“狗血喷头”，但他还是瞒着丈人，不顾家里已经断炊，偷偷进城乡试。科举，成了他生活的唯一内容。

范进终于中了举人，这意味着他将和穷困告别，但悲剧的浓雾却由此迅速升腾。当“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的报帖挂在范家破旧的茅屋中间时：

范进不看便罢，看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

别人用水把他灌醒，他爬起来又拍着手狂奔乱呼，跌落在塘里，挣扎起来，两手黄泥，浑身是水，鞋都跑掉了一只。此时的范进，已完全失去了“自我”，成为被科举功名异化了的可怜虫。

范进的道路是悲剧性的，他如痴如狂地迷恋这条路，强化了悲剧的力量。当他终于由炼狱跨入天堂的时候，同时也把